

民国成立前后的苏中地区报刊事业

朱季康

摘要: 民国成立前的苏中地区报刊事业的肇始具有独特的时空背景,清政府放松舆论控制政策与苏中地区的地理环境是其起步的基础,同时苏中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也为民国成立在江苏的推进提供了舆论基础。民国成立前后的苏中地区报刊作为一种新的传媒,为苏中地区的近代化及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是民国成立后推动苏中地区社会进步的主要精神力量之一。

关键词: 民国;苏中地区;报刊事业

作者简介: 朱季康,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成立前苏中地区中共报刊研究”(10DJB002)。

中图分类号: K258.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7.02.010

江苏苏中地区^①承接江苏南北的地理区位为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民国成立前后(19世纪70年代至“五四”运动前),苏中地区的近代报刊事业开始起步并有一定发展。

一、民国成立前苏中地区报刊事业

(一) 苏中地区近代报刊事业起步于清末

19世纪70年代,近代传媒已悄然渗透并逐渐影响苏中地区的舆论环境。光绪元年(1875),苏中中心城市扬州成为上海《申报》最早聘请特约记者的城市之一。此后,《新闻报》等也陆续派设驻扬记者、设立售报处。5年后,《申报》已在扬城设立三处售报馆^{[1]13}。《淮南日报》与《广陵涛》是扬州也是苏中地区最早创办的本埠近代报刊,但两者的详细创刊年代已不可考。目前我们可以确定创刊年代的苏中地区第一份近代报刊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创刊的《文明彙报》,这是苏中地区近代报刊事业的起点。

(二) 民国成立前苏中地区报刊事业的肇始具有独特的时空背景

首先,清末舆论环境的逐渐宽松创造了近代报刊事业发展的机遇,为苏中地区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戊戌维新夭折后,清廷重行报禁。“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2]刚勃兴不久的近代报刊事业暂入低谷。但随“新政”颁布,清廷对舆论的控制再度有所松弛。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出台了涉及新闻舆论的系列法律。尽管“造妖书妖言罪”直至宣统二年(1910)依然存在,《苏报》案、卞小吾案

^① 今江苏省扬州、南通、泰州三市所辖地区。

等迫害报业事件也时有发生，但整体而论，“新政”实行后的数年内，清政府对报刊的控制开始沿法制道路努力，即使这种努力的成果还很微弱，但客观上为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营建了相对合法的空间，苏中地区也受惠其中。“民国之前，各地鼓吹革命的报纸风起云涌，前仆后继，为中国报学史造成最光荣的一页，树立中国新闻事业的始基。”^{[3]7}

其次，苏中地区地理空间的独特位置为近代传媒事业的起步与发展提供了平台。

清中期的苏中地区曾是全国区域发展的模范，中心城市扬州成为全国三大都市之一，是中国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因而苏中地区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具备近代报刊事业发展的载体条件。进入 19 世纪后，苏中地区屡遭农民运动影响，城市物质实体及文化内涵损失严重，但仍有亮点呈现。以南通为中心的近代工商业异军突起，使南通成为近代中国转型经济的模范之一。同时，因苏中地区联系南北，毗邻宁、沪的地理位置，接受近代变革辐射较快捷，间接地促成了苏中近代报刊事业的起步。

清末，苏中地区有史可考的报刊有 6 种：《淮南日报》（清末扬州）、《广陵涛》（清末扬州）、《文明彙报》（1905 年扬州）、《星报》（1907 年南通）、《通师校友会杂志》（1908 年南通）、《如皋白话报》^①（1910 年如皋）。苏中地区特别是南通的近代化发展客观上要求启动文化事业的现代化进程。张謇的努力使南通近代工商业迅速成长，带动其他社会事业发展，为近代报刊事业的出现打开了局面。扬州城市经济虽然失去了往昔规模与地位，但仍然拥有相当数量的士绅群体，具有一定体量的市民读者群体。故两市的近代报刊事业在苏中地区率先崛起，且因扬州与南京交通便捷，而南通与上海隔江联系不畅，所以扬州近代报刊事业的起步较南通略有超前。可见，近代工商业的进步与一定数量市民群体的存在是促成苏中近代报刊事业起步的重要前提。

（三）民国成立前苏中地区报刊的价值

民国成立前，一些知名人士与革命者以近代报刊为载体，积极宣扬先进主张。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南洋官报》第 74 期就登载了《通州师范学校开学演说》^{[4]学务4}，为这所近代学校的创立大张舆论。又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为继续推行变法主张，张謇作《变法平议》，“一方面呈两江总督刘坤一审阅，另一方面通过中外日报馆印送，广为散发，扩大影响。”^{[5]22}很多民众也是通过近代报刊得以接受革命的启蒙，最为典型的就是学生群体。“辛亥革命爆发以前，通海五中学有部分学生，购买宣传革命的书籍和报刊，辗转传观。事为官厅所闻，来校搜查，这班学生已经得到消息，预先把宣传革命的书籍藏匿起来，结果一无所获。”^{[5]6-7}南通地方文杰管劲丞就曾回忆道：“辛亥前一年，我 14 岁，略通文理，偶尔阅读上海来的《民立报》《时报》《申报》《汇报》等，开始了解清朝官场的腐朽并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民立报》的言论最为激烈，记得当清朝皇族内阁成立时，《民立报》曾进行抨击。当时掘港订阅报纸的人还很少，只有一个姓胡的日本留学生，他家是胡家园的有名地主，他兄弟是法政学堂毕业生，订了两份报纸。胡家园在掘港西数里，邮政局不直接送去，要等胡家自取，所以常把这两份报纸拆开来看看，因此有人趁机去看。”^②可见，近代报刊已经逐渐成为苏中地区民众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之一。例如通州光复后，军政府总司令部通过《上海时报》发布消息来安定地方。“总司令处又发布了布告地方父老、军士和本部职员三个文件，措辞谦虚诚恳，目标在于安定地方，字面上只

① 该报有 1910、1912 年创刊两说，有如皋人周高潮考应为 1910 年说，见中共如皋县委党史办公室、如皋县编史修志办公室编：《如皋文史资料》（第 4 辑）第 2 页，编者 1985 年版。

② 摘录自管劲丞在《掘港光复记》中的记载。

提到共和而不曾提到革命一个字。文件都登载地方新闻上,同时并寄登了上海报纸。”^{[6]150-151}《民立报》就是其时刊登布告的上海报纸之一。同时,苏中地区的乡土风情、人文逸事也通过近代报刊而得以展现,如国学大师田北湖游历扬州府属高邮县后,作《戊戌三月高邮舟中》^[7],即登载于《国粹学报》上。民国成立前近代报刊对于苏中地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二、民国成立对苏中地区报刊事业的影响

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迅速传遍了苏中地区,未出两日,连僻在海隅的通州民众皆已知晓,“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不到两天,通州社会一般都已从上海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6]144}“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各省独立等消息都通过报纸传到掘港。”^{[5]261}苏中各地的光复情况也通过报刊得以传播,如《民立报》就曾先后登载《海门独立之笑史》(辛亥九月二十八日)、《东台光复经过》(辛亥十月十一日)、《扬子县光复》(辛亥十月初九日)等文。

苏中地区光复后,各地政权的组成与前清有所变化,封建势力依旧强大,但毕竟结合了立宪派、革命派的成员,其政权的相对进步意义值得肯定。斗争后的苏中各地政权主要掌握在军阀与立宪派手中,主要行政官员则基本由立宪派所担任,如扬州民政长李石泉、泰州民政长张淦清、兴化民政长余宜官、通州民政长张簪、如皋民政长沙元炳、掘港民政长金圻、海门民政长梁孝熊等。这些调整对于苏中地区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民国成立后,《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皆被废除。经过《中华民国暂行报律》事件的反复,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12日)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人民群众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首次载入了国家根本大法,对于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是一个绝大的推动。受此刺激,“民国成立,报纸新闻在量的方面增加了很多。”^{[8]15}“民国初元,全国报纸达五百家以上,在大革命之前称为全盛时代。”^{[3]7}苏中地区也与全国一样,短短两三年内,相继创办了《怡情报》(扬州)、《通报》(南通)、《共和演说报》(南通)、《扬州日报》(扬州)、《江淮新报》(扬州)、《如皋通俗报》(如皋)、《兴化乡公报》(兴化)、《民声报》^①(扬州)、《安宜日报》(宝应)、《泰兴报》(泰兴)、《民鸣报》(泰兴)、《友言报》(泰兴)、《民气报》(泰兴)、《皋鸣报》(如皋)、《通海新报》(南通)等十余种报刊。

袁世凯上台后,报刊生存空间又被压缩。至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同时有大批报人受到迫害。如创办于民国元年的《共和演说报》一贯对地方行政进行批判,袁世凯复辟后,该报坚持反袁立场,二次革命失败后,很快停办^{[5]263}。《报纸条例》《出版法》《戒严法》和《治安警察法》等法律条文的出台给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笼罩了一层阴影。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传媒史上被称为“癸丑报灾”。苏中地区整个1914年间也仅有一家《自治报》(扬州)创办。在黎元洪及段祺瑞执政时期,报刊立法又有反复,此时中国近代报刊的生存环境较为宽松。苏中地区的报刊创刊数量又有了一次较大的增长。1915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4年多时间内,苏中地区又创办了《教育杂志》(高邮)、《扬州》(扬州)、《如皋周报》(如皋)、《省立七种校闻》(南通)、《校友杂志》(泰州)、《十里春风报》(扬州)、《淮南报》(泰州)、《邗江周刊》(扬州)、《市廛公报》^②(扬州)、《江北商务报》(扬州)、《淮扬日报》(扬州)、《大声报》(扬州)、

① 原名《江淮报》。

② 1927年改名为《大江北日报》。

《高邮日报》（高邮）等十余种报刊^①。

民国成立后，苏中地区近代报刊事业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报刊数量上，还体现在报刊生命周期上。民国成立前创办的苏中近代报刊持续时间皆较短，如《淮南日报》《广陵涛》《文明彙报》等报刊。即使存续时间最长的《星报》也仅持续了5年。而民国成立后发行的苏中近代报刊除《校友杂志》《安宜日报》《泰兴报》《民气报》《民鸣报》《友言报》《襟江新闻》等发行时间较短外，基本都达2年以上，甚至达到10年、20年，其中生存时间最长的《扬州日报》达到了25年之久。考其原因，一者由于清末新政的施行还有一个时间量的积累，二者由于新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以及更加开放的新闻法令使得近代报刊事业的生存环境大大改善，三者由于改朝换代之际新闻信息量的供需也大大增加。社会于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普遍持支持与肯定的态度，利好消息的持续刺激是形成民国成立后苏中地区报刊事业爆发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民国成立后苏中地区报刊事业的业务进步

民国成立后苏中地区报刊事业的业务进步主要体现在报刊发行量、发行区域、纸张码号、版面安排、通讯联系、印刷、广告等方面。

（一）报刊发行量

民国成立后，苏中地区出现了一些期发行量在200份以上的报刊，如《民声报》^②、《扬州日报》（200份）、《大江北日报》（350份）、《江北商务报》（200份）、《淮扬日报》（200份）^③、《通海新报》（300份）、《皋鸣报》（700~800份）、《通报》（600份）等。报刊发行量的上升说明受众的增加与报刊业务实力的提升。

（二）报刊发行区域

苏中地区大部分的近代报刊创刊地集中在扬州与南通两市城厢，发行区域也基本以本埠为主，兼及周边地区。如扬州的《大江北日报》于公道镇设代销点，每天邮寄30~40份报纸代销。其时的苏中地区，扬州较南通、泰州高一行政级别，因而报刊的创办总数居多是正常的。但同级的南通、如皋却远高于泰州等地^④，其中如皋报刊在民国初年即有“全省六十县之楷模”^[9]之誉。跳出苏中地区来看，南通地区的报刊数量在全国同级城市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这也是与当时苏中地区城市发展规划相适应的，由于苏中地区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该地区存在着两大中心城市——扬州、南通。扬州是该地区的政治与商业中心，南通则得益于张謇所创造的“模范县”模式。两者都具备一定规模的广告市场，这就为以广告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近代报刊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苏中地区近代报刊的广告一般登在报纸的第一版位置，报名之后便是广告，一整版登不下便延至第二版，其地位比时评、新闻为重。但因为发行数量的限制，报价几乎不能赚得多少利润，大部分苏中近代报刊只能维持报馆的基本运行。

（三）报刊性质及资金来源

民国成立前后，苏中地区的报刊事业几乎全是民营性质，笔者对其中办报资金来源可考的31种报刊进行分析后发现，除了经营收入外，其办报资金来源基本有3种渠道：一是个人独资或多

① 尚有南通《公园报》等数种报刊也创办于此时期，但具体创办年代无考。

② 戈公振列其为民国扬州知名报纸，期发行量当超200份。

③ 《江苏月报》1934年1月1卷3期与《报学季刊》1935年1月1卷2期载。

④ 泰兴县虽有5种报刊，但发行期都十分短暂，社会影响很小。

人合资,共19种,占63%;二是在个人出资的基础上接受政府部门或组织的津贴,共2种,占5.6%;三是完全由政府部门或组织津贴支持,共10种,占32.4%。这些支持办报的政府部门或组织中,以教育会、通俗教育馆、校友会这类文化部门或民间组织为最多,非文化部门赞助的有《共和演说报》(掘港市议会)、《通报》(南通商会)、《扬州日报》(淮南盐运公署、江都县政府、江都县公安局、盐商同福详号)、《江淮新报》(淮南盐运公署)4家。严格考量,此时苏中地区还没有真正的官办报纸,被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列为民国建立后扬州的知名报纸之一的《扬州日报》,是与官方关系最密切的,也仅是接受盐运公署的津贴,而在人员、办报旨趣等方面并不受其约束。民营报刊一统苏中地区的局面既说明了民间办报热潮在民国成立刺激下的蓬勃兴起,也说明了苏中地区官办报刊的相对滞后。

(四) 报刊版面与通讯手段

民国成立前的报刊版面比较单调,“初期的中国报纸,新闻报告异常简单,大致不脱‘官报’的格式。”^{[8]15}从版面的安排上来看,一般为广告、时评、科普、本埠新闻、外地新闻、杂谈、连载小说之类。以苏中地区部分报刊为例,《文明彙报》第2册文稿目录为《神女权说》、《论征兵》、《拟五月藏女神庙碑》、《泰西风俗敬》、《地理问答》、《论大家齐心》、《主仆仇》(连载侦探小说)、《新儒林外史》(第2回)、《谐铎选择:学而时习之(二则)》、《教育改良唱歌》、《戒恼仙方歌》、《同人分咏七点诗》、《长至日饮莆即席口占选报》等。民国成立后,苏中地区近代报刊普遍开始加强对时政的报道,这也得益于通讯手段的进步。咸丰年间,南通开始出现民信局,至清末,通州城及周围乡镇有民信局70多家。光绪二十四年(1898),扬州开设邮政分局前,城内已有民信局21家^[10]。扬州邮政分局是全国最早建立的邮局之一。光绪二十七年(1902)设南通州邮政局。光绪八年(1882),清政府开始敷设上海至扬州、南通等地的电报线,并在扬州南河下创设官电局,办理往来官商电报事务。光绪二十年(1895),南通设电报局,开通国内电报业务。1913年3月,张謇及南通商界人士集资创办私营南通大聪电话公司。扬州电话局则设立于1915年11月,局址于左卫街(今广陵路),起初只办理市内电话业务,1919年4月开通长途电话业务。苏中地区尤其是扬州,其近代化的通讯机构及基础设施的起步在全国是比较早的。反映在近代报刊事业上,约在1913年左右,苏中地区各报已开始较广泛地运用电讯接受时政信息,较之清末时期依赖于转载其他报刊的内容来说已经是明显的进步了。

(五) 报刊装备技术水平

民国成立后苏中地区近代报刊的技术装备也有显著提高。清末的报刊一般用石印与油印印刷,如《文明彙报》即为石印。民国成立后,中国报刊界中铅印开始逐步代替油印、石印成为主流趋势,苏中地区也有部分报刊尤其是资金较为充裕的大报开始采用石印技术,以努力提高印刷质量。以扬州为例,《大江北日报》先后由扬州贫儿院印刷所、旌忠寺张旭东私人所办集贤斋印刷所等专业的印刷机构代印。《淮扬日报》创办人陈臣塑在扬州辕门桥(今扬州市国庆路新华书店处)创办飞狮公司,代印《淮扬日报》,飞狮公司关门后,转由扬州贫儿院印刷所印刷。再如南通,《如皋白话报》初为石印,1913年改为铅印。《皋鸣报》则是自购铅字印刷机印刷。《通海新报》创刊伊始即为铅字印刷,先由南通翰墨林印书局承印,后自办通新印刷公司印刷。

可以说,民国成立后的苏中地区报刊事业,在业务上是有明显进步的。

四、民国成立后苏中地区报刊事业的精神进步

民国成立前后苏中地区报刊作为一种新的传媒,为苏中地区的近代化发展及民主革命思想的

传播创造了条件，报刊所刊载的进步内容也转化为民国成立后推动苏中地区社会进步的主要精神力量之一。

“在民元以前，大多数的中国报人是具备些‘第二手’的新知识的‘士大夫’。”^{[8]18} 戈公振曾评价：“当时社会上所谓优秀分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新闻报刊事业。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以发抒抑郁无聊之意思。各埠访员，人格尤鲜高贵，则亦事不可讳者。”^[11] 虽有所绝对，但新闻人社会地位的低下在当时确是不争的事实。所谓“新闻记者等于‘亡命徒’”^{[8]15} 的观点也甚有市场。民国成立后，新闻报刊人群体出现了职业化趋势。扬州籍报刊业人士樊遁园、刘师培、徐公时、张少斋等 4 人的从业历程大致相沿，正可说明该时期苏中近代报刊业人员的职业化转变。樊遁园先后任《镇江商务报》编辑^{[1]239}、《扬子江丛报》及《扬子江白话报》发起人、芜湖《商务日报》主笔，最后为淮北票盐笔墨代表。刘师培先后任《俄事警闻》编辑、《警钟日报》编辑主任、《国粹学报》主笔、安徽公学、皖江中学等中学历史或伦理学教员、《民报》撰述、《天义报》（《横报》）主办人、端方幕府幕僚、四川国学院教授、《四川学杂志》主笔、阎锡山的高级顾问等职。徐公时先为安徽旅扬公学堂长、后为《江淮报》（《民声报》）报馆主任。张少斋先后担任南京大总统府警卫团司书、《扬州日报》创办人、《新闻报》驻扬记者，期间曾任江都县商会会长。4 人中，樊遁园屡受压制，几次办报皆无善终。刘师培虽曾为报人，但国学为其致力方向，一生为政治所奔波。樊、刘为近代报业非职业化人物的代表。而徐、张则一生专职，几近全部精力致力于近代报刊事业。1912 年，徐公时还作为扬州报界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报界俱进会特别大会，更是肯定地证实其职业报人的身份。在民国成立后创办的可考的 21 种苏中地区近代报刊中，个人做报刊创始人的情况为：教师 3 人，商人资本家 1 人，官僚 1 人，知识分子 5 人，另有张謇（创办《通报》）、朱康（创办《大江北日报》）2 人既为资本家，也为官僚。这种创办者的身份分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内涵。教师是较其他社会阶层更早接触并接受新知识、新社会改良事业的群体之一。如扬州盐商后代徐公时，创办《民声报》是其政治思想的一种展示。办《通报》虽仅是张謇创办的众多社会事业中的一件小事，但因其身份，客观上也起了鼓励办报的效果。该报创办后由南通商会接管，为张謇地方自治蓝图服务。

再来看创办报刊的组织身份，江苏省立第七中学、扬州学界、英算专修馆校友会、如皋劝学所、如皋教育会、如皋通俗教育馆、掘港商学团等皆为民间教育文化团体。扬州学界历来以好学敏思、激扬国事出名，学生运动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如皋劝学所、如皋教育会、如皋通俗教育馆、掘港商学团都是南通学界、教育界所办，其中掘港商学团的成员是由通州师范和如皋师范的回乡学生为主体，包括部分地主、商人子弟在内。如皋劝学所、如皋教育会、如皋通俗教育馆则为公益性教育团体。这些团体都属于较早接触并接受革命潮流与近代思潮的团体。

近代报刊事业的地位也在逐渐提高。同盟会员、南通人施方白就说过这么一段传奇。“1911 年我在县立师范教课，曾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希望改变现状的文章，由一位举人帮我修改的。自后一般人渐渐地认为我的社会地位增高了。更有年龄相若的亲友和同学们鼓励帮助，居然不化一文以 61 票当选了县议员，在县议员中又被选为参事员。”^{[5]32-33} 很能说明当时近代报刊事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报刊名称也反映着报刊的旨趣与性质。民国成立前后的苏中地区报刊名称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以地为名，如《淮南日报》《安宜日报》《扬州日报》《扬州》《邗江周刊》《淮南报》等；二是以报刊内容为名，如《如皋白话报》《襟江新闻》《怡情报》《江北商务报》等；三是以最具时代特征的有民主革命等气息的名词为名，如《文明彙报》《民气报》《民鸣报》《民声报》《共和演说

报》《自治报》《江淮新报》等。民国成立前,苏中地区报刊以前两者命名方式为主。民国成立后,民主空气扑面而来,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后新闻舆论的开放使报名的确定也灵活了很多,第三类报刊名皆出现于民国成立后,带有明显政治意味,如《江淮报》改名《民声报》,其推动民意民生的办报宗旨表现得十分明显。

民国成立后创办的苏中地区报刊与邸报等清末报刊截然不同的是宗旨,其宗旨大多为启迪民智、寓教于乐、传达政讯、推动社会进步。“不管那一家报馆或那一家通讯社,对统治者的关系怎样,赞助也好,反对也好,或者是漠视也好,都不能不成为政治的工具。”^{[3]6}虽然“民国成立,报纸新闻在量的方面增加了很多,不过大多注重政治方面,尤其国内新闻,至于新闻的质,仍然谈不到‘时间性’与‘正确’。”^{[8]15-16}但很多报刊已经在努力。如《民声报》在《申报》上刊载出版广告时提出该报宗旨为“应时务之需要,希言论之自由”,“宣达民声,期殫天职。”《邗江周刊》在出版启事中称该报“说理详明,记载确实,选择颇精”,“足以开通风气,别开生面”。虽然其时还仅是一种说辞,有待于日后的观察。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报刊主办者显然已经自觉地希望自己的报刊能够达到为社会服务、为时代倡言的境界。此时的苏中地区报刊事业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且伴有一定的不成熟性。时代性体现在报刊开始履行其监督社会、发挥民主舆论的功能。如南通最早的同盟会会员刘光谦在民国成立后,“仍从事文化宣传和国际问题研究,继续鼓吹革命,在南通的《通海新报》上写了不少介绍国际关系的文章和评论。”^{[5]27}《扬州日报》仿《申报》“自由谈”辟“自由语”栏目,对社会现象进行评论。《皋鸣报》因经常发表抨击腐败政治的文章,而得“炮报”之名。《共和演说报》《皋鸣报》等都对袁世凯称帝大肆谴责,痛快淋漓地发挥了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不成熟性则表现在受社会环境影响,存在着一定的封建性及落后性,如《十里春风报》以社会新闻为主,不乏诲淫诲盗的内容。不成熟性还表现在斗争策略的幼稚上,如发行范围几近整个苏中地区的《淮南报》只因1917年刊载了“倪某典产运动警察分所长缺”一事,引发群众袭击泰县知事郑辅东,而遭勒令封闭。此事发生的背景是中国社会法制的落后,但仅一条真实的新闻报道就致该报倒台,也反映了该报缺乏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同年,《自治报》创办人茅幼安与江都县知事周光雄发生争执,被抓进牢房,后经说情才得以保释,《自治报》也因此停办^{[1]31}。这种现象虽不多见,但也绝非偶然。

报馆不再以免费赠送为发行主要渠道,以质量吸引更多读者成为各报尤其是商业性报纸的主要选择。《通报》等报纸登载的《丝鱼港民变记闻》《会衔呈报剿散泉匪之公文》《西乡乱事摭谈》《招买没收之匪产》^{[5]34}等文因事关当地,深受读者关注。《皋鸣报》为迎合社会各阶层的口味,每期的评论都有白话文与文言文两种版本。《怡情报》立足于扬州本地市场,多编扬州本地新闻,尤其致力于办好副刊,其文字诙谐,妙趣横生。创办人之一杜少棠时在其副刊连载小说《青丝发》,一时“扬州小杜”之名满扬城。在苏中地区本埠报刊自身竞争的同时,它们还要面对来自外地尤其是沪、宁等地大报的挑战。苏中地区报刊除部分由报贩零售外,大多由订户向报社直接订阅。上海《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时报》,南京《新江苏报》《江苏省报》《苏报》等报刊在苏中地区各城镇皆有销售网络。

“新闻纸所以能成为有力的武器,毫无疑问是为了她和大众有关系,她是大众的组织者,大众的教育者,大众的耳目,大众的喉舌,新闻纸之所以能阻止大众,教育大众,正是因为她能尽其大众的耳目喉舌的责任,否则大众是不会接受她的教育或组织的。”^{[3]6-7}民国成立后的苏中地区报刊事业最大的亮点体现在:报刊的社会职能得到大大加强,报刊开始发挥舆论监督、开通民智、传达信息等社会职能。此外,办报人新闻价值观得以确立。办报人已经开始独立地对新闻事

件作出判断与评价，大部分报刊的价值观开始循着民主、法制、公理、道德的方向发展，朝着社会进步的方向前进。虽然与同时期报刊事业先进地区相比，苏中地区近代报刊事业刚刚起步，差距也很明显，但这并不妨碍它前进的脚步。

参考文献：

- [1] 王庆云，费昌华. 扬州报刊志 [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闻研究资料（第12辑）：上册 [M]. 北京：展望出版社，1982：294.
- [3] 恽逸群. 民国成立以来之中国新闻事业概观 [J]. 战时记者，1947（3）.
- [4] 张殿. 通州师范学校开学演说 [J]. 南洋官报，1907（总74）：4.
- [5] 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南通文史资料第17辑江海春秋（南通文史资料精选上）[M]. 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
- [6] 管劲丞. 辛亥通州光复记 [M] // 辛亥江苏光复. 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1.
- [7] 田北湖. 戊戌三月高邮舟中 [J]. 国粹学报，1905（3）：11.
- [8] 刘豁轩. 报学论丛 [M]. 天津：天津益世报社，1946.
- [9] 中共如皋县委员会党史办公室，如皋县编史修志办公室. 如皋文史资料：第4辑 [M]. [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 1985：1.
- [10] 扬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扬州市志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695.
- [11]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M]. 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11.

Modern Newspaper Business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Jiangsu Provi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u Jikang

Abstract: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ewspaper business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Jiangsu Province started in a special time background. The loose public opinion control by the Qing court and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the central region of Jiangsu Province were its starting point. Mean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newspaper business provided a public opinion basis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Jiangsu Province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odern newspaper business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Jiangsu Province, as a new medium, helped to spread modern and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was one of the major spiritual powers to promote the social progress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Jiangsu Province.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entral region of Jiangsu Province; newspaper business

（收稿日期：2016-09-22；责任编辑：沈秀）